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60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共产风”越刮越猛	1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
中央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	2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2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	3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	3
《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4
“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	4
《二年总结》	5
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谈	5
北戴河会议研究国际国内问题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	6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	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7
《12条》	7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举行	8
“甘肃省委贯彻中央紧急批示”的第四次报告 ..	8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9
毛泽东：1961 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9
中苏论战开始	10
中苏联合进行南海水声考察	26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拢截流	27
建设四个新技术配套厂	27
国务院要求妥善安置归国华侨	28

农村开展“三反”运动	28
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探空火箭(T-7M型)发射成功	30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31
建设安徽广德探空火箭发射场	32
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的规划	33
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三次学部会议	33
首次进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	34
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科学考察学术总结	35
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成立	36
铀矿资源的调查研究	37
“一保、二补、三探”	37
甲种分离膜的研制	38
中国第一枚气象火箭(T-7型)发射成功	40
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	41
核燃料化工腐蚀及化工原材料研究	44
核燃料萃取剂的研制任务	44
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计划	45
完成青海、甘肃的科学考察计划	46
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引领国防科技新时代 ..	47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建成	58
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59
小资料	75
世界部分	76
世纪回眸	76
南非发生“沙佩维尔惨案”	76
喀麦隆独立	76
人类第一次将动物送入太空	77
美国发射第一颗气象卫星 TIROS-1	77

美国建立卫星子午仪 (Transit) 导航系统	79
多哥脱离法国独立	86
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个火星探测器	87
人类探索火星的历程	89
马里独立	99
塞内加尔独立	100
比属刚果成立独立的共和国	101
韩国总统李承晚下台	103
日本首相岸信介下台	103
沃伦·巴菲特经营合伙公司的 1960 年	104
第一个计算机化事务处理系统 Sabre	112
第一届欧洲足球锦标赛在法国举行	114
第十七届夏季奥运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118
伯内特、梅达沃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	119
小资料	124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共产风”越刮越猛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由于夸大地估计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就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

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中央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通过了由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以彻底扭转目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势。

会议确定了扭转经济状况的具体方针，即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逐步实现综合平衡。调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争取快，准备慢。会议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两项中心任务：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这是克服困难、调整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加强对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强支援农业战线，以促进农业发展。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都在会上讲话，向全党干部提出要以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战胜困难。他们批评了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另一种是恐右心理，怕承认困难被说成“右”。

会后，大幅度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展开，中国的经济开始逐步走出困境。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

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表中央

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第二本帐比刚刚

通过的第一本帐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 2100 万吨到 2200 万吨”。

《二年总结》

6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 3 年（1960 年到 1962 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二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 3 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 10 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 10 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谈

6 月 24 日至 26 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 6 月 21 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

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北戴河会议研究国际国内问题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

第一书记。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统统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2条》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举行

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甘肃省委贯彻中央紧急批示”的第四次报告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甘肃省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

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1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钢、铁、煤、运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毛泽东：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

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中苏论战开始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料到，这一天，奉行他革命理论的世界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他的理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战。

众所周知，中苏两党、两国曾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内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国际上鼓吹美苏合作，和平过渡。这样，中苏两党就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苏共当时以大国党自居，要求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它的指挥棒转，受它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战略需要，甚至提出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横加指责。

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进行必要的反击。3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收集列宁有关

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在列宁诞辰 90 周年发表。同时准备加紧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对我党的指责。

1960 年 4 月 22 日，列宁诞辰 90 周年。《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以后，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引起很大的反响。6 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同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不屈服压力，进行有力抗争。同年 7 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也严重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以后，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 1966 年 3 月，两党关系中断。

（一）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亦明确表示支持新中国，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苏关系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先后

到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从 1950 年到 1957 年，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国建设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苏两国还在军事、外交领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等等。

这种类似“蜜月时期”的中苏关系持续了好几年。其间苏联虽然发生过斯大林逝世，新领导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对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未产生影响。与“蜜月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相适应，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则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尽管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却从未将“埋怨”上纲到“意识形态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开地互相抨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批评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时，中国的领导人却从未这样说过，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等都没有这样说过。其实，这并不奇怪。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

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却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不能不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像过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苏共是列宁缔造、斯大林领导的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头羊，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榜样。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国只能紧跟苏共和苏联，只能继续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不可能也不敢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有任何怀疑。即使对苏方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论、路线、政策上怀疑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蜜月时期”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中共和新中国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的结果。

然而，中苏“蜜月关系”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虽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却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中苏关系也难免会发生变化。果然，从1956年初开始，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首先受到冲击，稍后，中苏“蜜月关系”也随之逐渐发生动摇了。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